



# 文学陕军—— 劲旅的换代与强势的消长

□冯肖华

素以劲旅称世的陕军,在社会变革的多元文化冲击下,昔日文学强势的式微,和当下作家的换代(有论者称为“作家断代”现象),引起了学界的普遍关注。

其实,文学的此消彼长,因素是多重的,很难就某一缺失便抽绎出个精准的律理来。文学陕军的强势就其先锋性,一直以来被学界看好。这不仅因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柳青、杜鹏程、王汶石、李若冰等文学成就先机的奠定;更因了这批来自延安文艺圈,寻得了文学真谛,担当文学使命、胸怀民族忧患、具有伦理责任的一代陕军前辈文学薪火和文学精神的代际传递;使后继仰承了这一富有生命力的、鲜活的文学热脉、地缘血脉、人文命脉,再造了文学陕军之创作新高和先锋的延续,并生发了标识文学陕军特色的路遥“交叉地带”、贾平凹“商州系列”、陈忠实“关中叙事”、红柯“西部书写”及叶广岑“家族话语”等诸多稳定成型的、经世可存的文学品牌。

很显然,品牌递增,说明文学陕军创作在延伸。八十年代走高,九十年代多元,以及新世纪文学样态愈加密集。强势文学效应更在于激发了“70后”、“80后”甚至“90后”新生代文学向往的涌动,尤其是以《平凡的世界》《白鹿原》《秦腔》荣膺三届“茅奖”,所蕴含的三种如李建军概括的文学精神气质,即“高原型”(路遥)、“平原型”(陈忠实)、“山地型”(贾平凹),以及笔者认为的“稻谷型”(柳青)、“铁血型”(杜鹏程)、“村舍型”(王汶石)、“拓荒型”(李若冰),这样的源远流传后的整体性陕西文学精神的多质多元与多彩;和与此同时呈现在写作形态上的史诗气度,伦理形态上的责任精神,价值形态上的使命取向,情感形态上的忧患意识,色彩形态上的黄土地质地,技术形态上的求变多维文学的品质。这无不反映出文学陕军潜在和显在的创作强势。而强势涵盖,尽在文学陕军前三代。这是特定时代所铸就的强势文学风骨和作家特有的人格质基。文学陕军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淘漉中,选择的是民族精神的演绎和社会进步的记录。与其说这是一种强势文学的书写,不如说是在自觉提供蕴含精神砥石的社會核心价值。

应该看到,文学强势的可否持久,是与时代、作家、文学的传承、师承等因素的转换渐变有关。正如刘鐾在《时序》《物色》篇中所言:“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从这一意义上看,前代的文学强势作为一种资源,一直以来在激励着后继新生代。他们也的确以其最大的潜在在谋求文学的雅洁和神圣,与时代的通达之大气和丰盈之底气,表现出对文学的依然虔诚。然而,文学强势的日渐式微现象,还是落在并逼仄着陕军新生代群体。有论者称之为作家“断代现象”。对此,笔者不敢苟同。自古文学无断代。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学,其能指在于以

无形向有形的渗透,或潜移默化式的入侵,也即文学意识的自在流动。所谓“断代”,我以为只是个文本层面的含义,也即陕军新生代群落仍未见聾声文坛强势文本产生而已。他们的缺失更多在生活认知程度、情感投向判断、叙事文本选择、写作心态调适,以及知己知彼优势互补的把握等方面。正视了这些问题,陕军新生代的强弱转化,此消彼长可发生质的变化。

那么,文学陕军强弱转换的瓶颈是什么?新生代突围的出口又在哪里?

从文学陕军的现状看,前代文学强势的弱化现象,的确给“70后”以降的新生代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这个群落据陕西文学大普查获知,其特点是群众、体裁、基座大,创作阵营规模大大超过了前代。40—45岁之间的作家1787人,“70后”作家474人,“80后”作家306人。职业形态呈现出体制内、打工族、漂流者、农民工、校园写作者等类型。创作分布在长篇、中短篇、诗歌、散文、杂文、报告文学、影视文学、儿童文学和文学评论等领域。他们中的张金平、李沙娜、杨则伟、张宇娟、韩梓,及“90后”的高璨都已文坛有声,榜上留名,且较早地成为“夏衍杯”“冰心作文奖”的得主,成为被媒体推评的全国十大“90后”作家。陕军新生代的这一后续,再加上除红柯等先行者之外的“60后”的温亚军、唐卡、丁小村、杜文娟、谭易、艾武林、伊沙等;“70后”的李小洛、周喧璞、孙卫卫、方晓蕾、阎妮、王朝阳、吴梦川、王飞、杨广虎等,其创作已经有了自己较稳定的生活认知场,也相应写出了属于他们自己“场”内的标识性作品,初步具备了生活认知的较好的思维定力,体现出在生活认知上的应有智慧。

然而从前代文学陕军强势的存续和赓延,与下代的涵融和积蕴之要求观察,陕军新生代的上述文学表现,与生命之文学或者文学生命之筋络血脉标高尚有距离。这恐怕就是影响陕军新生代走强的瓶颈,以及所要突围的出口。“谁想要当作家,谁就必须在自己身上找到自己——一定要找到自己。”这是文学大师高尔基的话,是说文学作为精神美的一种表现形式,必使外界的一切生活化为“我”的血肉表现出来,这才是活生生的有血脉流动的生命文学。所谓“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就是这个道理。“新时期”以来,就其整个新生代创作而言,如有学者所判断“现在的某些70后作家,他们的写作是快乐原则,没有深度,是消费时代的作品”。这个现象在陕军新生代中并不鲜见。如陕军新生代,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面对生活形态的纷呈多变,其生活认知功力显然不足,认知思维受社会文化生态的濡染而漂移。在如何捕捉具有潜质的生活形态上显得有些迷茫与浮泛,急躁而不得其要。不能恰当确定适合自身

## ■评 论

##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重庆声部

□李庆华

重庆作为曾经的现代文学重镇,在“新时期”忙碌丰收的景象里却几近失声。虽然,一批学者一直试图从边缘立场发出“巴蜀学派”的声音,但最终也未获得应有的认可。这其中最大的原因莫过于长期以来,重庆作家在现代代文学史的论著中踪迹寥寥,更兼没有一部集中展示重庆文学实绩的史著,所以无论巴蜀学派如何致力,最终不免为他人作嫁衣罢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研究的方法和视角不断更新,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内经济发展不平衡,区域文学研究渐渐开始勃兴。于此同时,各种地方文史或涉及区域文化与文学的论著开始破土萌生。周晓凤主编的《20世纪重庆文学史》即是20世纪中国文学重庆声部的发声之作。

周晓凤并不只是试图在众声喧哗中,发出属于巴渝学者的声音,他的这部著作显示出更高远的立意。中国当代的文学研究,有着横亘的高墙,分别存在着“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古代文学”不同的研究格局。可以说,长期以来致力于文学研究的学者安守着属于自己的领域,似乎各学科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直到1985年,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三位学者首先打破学科界限,试图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打通各个学术研究的区隔。一时间,响应者批评者各执己见,争论不休。然而此后的事实证明,这一观点“曲高和寡”,学术界在盛赞的同时,又都回到各自的领域闭门自封,真正以厚重的文学史研究或理论研究回应者寥寥可数,周晓凤可算是其中一位。以《20世纪重庆文学史》这部厚重之作,将重庆上世纪初开始的近代文学向现代文学的转变、过渡和完成历史地呈现,以此作为对整个中国文学的语境中窥豹。他对重庆文学生态的描述,也试图昭示着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的生态。尽管他的叙述是属于重庆本土的,而且自始至终都在描述重庆文学的发展和困境,但这一论述却是建立在他对“区域文化”“国家文学”“世界文学”发展的合理构架之上的,所以,周晓凤在部分肯定重庆文学发展的实绩的同时,更多的是对重庆

## ■书 讯

### 我们凭什么打赢未来的战争？

创新的意义就在于颠覆,题材的颠覆、人物的颠覆,当然,它给读者的阅读感受也是颠覆性的。王玉彬、王苏红的长篇小说《黑鹰基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9年出版)就是这么一部充满了颠覆性的新军事小说。

《黑鹰基地》表现了一群科学家的故事。胡莎柳作为一个女性,既要承担为妻为母的责任,还要承担着普通女人所无法承担的繁重的科研工作,尽管她赢得了“导弹之母”的美誉,但她的内心深处却伤痕累累;丁一也是如此,事业的辉煌掩盖着的却是家庭生活的一片惨淡。不过,生活中终究还是有几分亮色的,他们各自都在寻找着青年时代在隧道里那场连对方的相貌都没有看

场和离场的认知转换的关键问题。透过现象汲取本质,这是一道高深的写作学技能考评题。

关于本我写作生活场的认知。陕军新生代作为文学年龄、实践历练浅的青年作家,对生活的认知,不仅要具备普泛认知的能力,从阔历面上扩张视野;更要具备自我写作生活场的定位认知能力,“在自己身上找到自己”(高尔基语),去进一步选择适合自身审美思维、审美习惯、审美表现的某一领域生活,做深层精细的过滤、判断,去伪存真,去粗取精,以充实创作所需的生活资源,使丰沛充盈的生活热烈时时冲击作家内心情感的奔涌,并朝着预定的审美方向自然萌动。这种建立在生活基础之上的、以巧妙的叙述达成的作品,其色彩、文质、基调、情感必然与生活成为互文,从而产生出具有深阔粹质的互文意义。这即创作动力学原理。那么,陕军新生代在如何认知本我写作生活场,如何权重生活根本的重要时,我以为需细心地研究前代作家的经典经验,务必舍弃在心上向东“解构”西“先锋”、“前殖民”“后现代”盲目吞吐的疲劣行为。比如柳青在皇甫村十四年,舍弃业已完成的三十万言的旧作,投身于新的生活场的《创业史》的写作;杜鹏程在移出准战争生活场后,又入战场亚战争——筑路工地生活场(脱下军装的军人)。他们无不在选择适合自我写作路径的乡村、军旅生活场,并坚持不懈,没有生活认知上的过大跳跃性。贾平凹亦然,从文三十余年,生活场由早期单纯的商州叙事,到近年城乡复调的《秦腔》《高兴》的写作,清醒地保持着生活场的出入一致性,在纷呈多变的生活与创作视野问题上不曾有过错位。相反,生活认知的迷途、紊乱和错位,一时间也可能四面着墨,题材更新,八方成文,且为另类写作,其作品样式似杂货店琳琅满目,然而能否上升为品质性写作还是个问题。元好问《论诗三十首》:“眼处心生句自神,暗中摸索总非真。画图临出秦川景,亲到长安有几人?”这说的对生活认知的专一、深层与精细,眼观心思、心领神会、举一反三的道理。当然,在这个问题上,陕军新生代的突围,并非朝夕之功所能就。但能有个清醒的认知,能建立起符合文学创作规律的合理理念,就是个好开端。

关于生活路径选择的认知。作家生活路径的选择,与自身文学成就的取得在心上上应该是一致的。明代文学家胡震亭在论唐杜甫时说:“凡诗,一人有一人本色,无天宝一乱,鸣候止写承平,无拾遗一官,怀忠难入篇什,无杜诗矣。”可见,生活制约文学,生活路向、经历是产生作品的基础。作家只有虔诚地生活,选准路径,才能写出气理绵劲的优雅文学。选择什么样的生活场,前代文学陕军和陕军新生代有着明显的路向上的不同。前代作家取“下行策略”,即由城而乡,即由柳青所说的“沉下去”。新生代则普遍为“上行取向”,即向乡而城。究竟什么是生活质量?作为以创造精神美为能事的作家而言,我以为提高作品质量,树立精品意识是创作的核心价值观。尤其是以劲旅称世,“以作品说话”(贾平凹语)的文学陕军。如此说来,陕军新生代这一拔根、弃土、离乡之“上行取向”的生活路径认知,势必影响作品质涵的厚重,濡染之间变得浮躁曼妙,导致作品质地稀薄的可能是极为自然的。当然,时代的不同,我们并不苛求陕军新生代模仿前代作家“下行策略”去作秀扮酷。但新形势下新的“下行策略”之生活路径无论如何是需要的。关键在于陕军新生代怎样去做,如何去认知了。

影响。如他对阿奎的《依仁巷》评论和对梁平的评价,就从区域文化出发、颇有见地。这些研究成果,尤其是《20世纪重庆文学史》以切实的证据和学术分析,证明了区域文学的存在意义。

《20世纪重庆文学史》是一部由周晓凤主编,集结了张中良、程光炜等诸多现当代文学专家共同完成的,准备充分、酝酿严谨,文章整体水平较高。最令人称道的是该书体例严谨、结构鲜明,论述精到。全书共四编,几乎涵盖了整个20世纪重庆文学方方面面。在传统论述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基础上,每编另设两章专门论述儿童文学和文学理论批评。尤其是对于儿童文学的强调,一方面显示出他宽阔的眼光,另一方面又突出了重庆本土儿童文学历史上的发展和现状。

20世纪重庆文学最值得论述的大概就是诗歌了。作为内陆的大都市,重庆既不像外人想象的那样闭塞,也不跟从潮流亦步亦趋,在小说散文发达的时代,重庆却走出了一条“诗城”的特色之路。对于这一现象的关注,使得周晓凤更多从地域特色和区域文化出发,研究探讨重庆本土诗人和来渝定居的外来诗人。由此得出了很多颇有趣味和价值的结论。但是,他过多关注于诗人创作,对于这种现象的论述多是零敲碎碎的,读来大有意犹未尽的感慨。

另外,周晓凤在该书最后附录了20世纪重庆文学大事记,为后来者进一步研究重庆文学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这既体现出编者治学的严谨,也显示了其提携后学的一贯作风。当然这短短70页的大事记与皇皇数十万言的史著相比,终不过是凤尾之翎罢了。

《20世纪重庆文学史》以其严谨的结构,周详的论述,煌煌47万言,向我们展示了重庆文学的创作实绩,刷新了一些人对于重庆文学粗浅的认识,那些提出重庆文学史有无必要写的论调将随之遁去。它以不可回避的事实向学术界宣布:重庆文学不光可以写史还有进一步深入研究下去的必要。可以说,从这部史著诞生之时起,重庆结束了他在现代代文学史上无文的历史,开始以一个直辖市、一个经济腾飞的文化和大市和一个创作异彩纷呈的文学大市的形象屹立在祖国的西部。这部史著也昭示了区域文学、重庆文学还有更多的可供研究发掘的价值。不可忽视的是,这部文学史同时也是重庆文学主体意识的一次集中而完美的展示,这对于重庆文学主体性建设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所谓“蚁族”,是指“80后”中一个鲜为人知的庞大群体——“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之所以将该群体名之为“蚁族”,是因为这个群体和蚂蚁有许多相类似的特点:高智、弱小、群居。《蚁居》以“关注80后蚁族生存状态、剖析当代房奴现实生活”为主题,全面展现了“蚁族”在大都市高房价压力之下的生存现实。在繁华的大都市里,房子与爱情互相左右,犹如呼吸与空气一样如影随形,“80后”的一对年轻人,在一个以“40平方米”为圆心的圈子里演绎着他们的辛酸与无奈。爱情,苦难,挣扎,脚踏,退缩,咬紧牙关……小说很生活化地再现了“蚁族”的身影,全面地展现了他们的奋斗,他们的挣扎,他们的浮沉。

高房价已经成为新一代年轻人不可承受之重。《蚁居》不仅仅是一本流行小说,更是一个社会化的大命题,对广大读者而言,必将具有醒世的意义和提示的价值。(文 平)

## 比生活更坚韧

□蒋 韵

几年前,在黄河边上那座著名的道观——永乐宫里,我曾有过留宿一夜的幸运。那是一个月色清明的秋夜,我们——我和雅茜,在园林里漫步,那应该是道观的后园吧?我弄不懂它严谨又神秘的建筑格局。荷塘、竹林、小桥流水与虫鸣蛙唱,一切,都因为那圈高高的红墙和大殿的投影而变得更加静谧、虚幻和意味深长。

记得后来我无数次和雅茜说过,那是她的宝藏。它给她的,比她意识到的要多。其实,那时,我并不真的知道,这河边伟岸古老的建筑,这恢宏的千年道观,对一个在最美好的青春岁月与它相逢相遇相守的女人,对于一个有梦想、有渴望、生机葱茏盎然的女人,究竟意味着什么。直到我看到这个故事,这本书。

其实,此前,雅茜曾多次和我谈过她构思中的这部长篇小說,它的结构,它的布局,它的立意,等等。但当我真正看到这个故事时,我发现,故事本身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已远远冲垮了她事先预设的堤坝:它肆意横流,不管不顾,呈现出一种不可驾驭的赴死的激情。它早已不再是一个纯粹的爱情或情感的故事,它也比作者希望它所承载的思想混浊强大。包括它的题目:《此生只为你》,这个“你”,是谁?

当然,在书中,在女主人公宋梅影、梅子心里,这个“你”,有所指指的。十四岁的某一个午后,偶然的十分钟,命运敲门了。它以一张速写的方式,敲开了一个少女的生命花园,从此,每一分每一秒,那个风流潇洒才情并茂的老师洪流,就成为她的呼吸,她的脉搏,她的心跳,她一生的等待与梦想。但是,后来发生在宋梅影身上的故事却告诉我们,这个下午,这短短的十分钟,或者说,这个神一般被她珍藏的男人,与其说是一个少女爱情的觉醒,不如说是对一个梦想的启蒙;那不是爱,那是固执的,一往无前的、令人肝肠寸断的人生的希望——能够自由、美好、尊严、浪漫地生活。

而不仅仅是“过日子”。

生活,而不仅仅是“过日子”,在小说中,作者借宋梅影的情人高扬之口,宣示出了这一人生的理想。毫无疑问,高扬,是作者塑造的最为生动饱满、最为鲜活、也是最为复杂的一个人物,女主人公与高扬的恋情,更是全书中最精彩的部分。那黄麦苳的故事,多么感人!当这个叫高扬的男人,骑车赶四十里路,汗流浃背,就为了自家树上结的这唯一一枚果实,为了把它完满地、芳香四溢地捧给她的爱人,那一刻,万物都要为之动容。“生活”在那一刻,是多么诗意,多么仁慈!那一刻,他放下了武器……这个出身于农家的剧作家、文人,一生几乎无时无刻都在战斗,都在为一件事——“身份”而战;他所有的挣扎、奋斗,他所有的悲哀和无奈,他的愤怒和愤慨,他的牵挂与眷恋,他极度的自尊与同样自卑的源泉,一切,都源自于那个“半村半郭”的“身份”。这个宿命的、无法挣脱的悲哀,迫使他愤而喊出:“若去泉台仍做半村半郭事,轮回尘世甘为可耕可读人”,也是他最终不能割舍他

本版责编:刘 頔 饶 翔